

069
69



中央民族大学“985工程”项目成果

政治与行政

Collected Papers on Political and
Administrative History

■ 李俊清 著

史论集



人民出版社

政治与行政史论集

李俊清 著

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陈寒节

责任校对:湖 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政治与行政史论集/李俊清 著

—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08.12

ISBN 978 -7 -01 -007240 -1

I. 政… II. 李… III. ①政治制度 - 历史 - 中国 - 文集
②行政管理 - 历史 - 中国 - 文集 IV. D69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(2008)第 129756 号

政治与行政史论集

ZHENGZHI YU XINGZHENG SHILUN JI

李俊清 著

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18

字数:265 千字 印数:1 - 2500 册

ISBN 978 -7 -01 -007240 -1 定价:35.00 元

邮购地址: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:(010)65250042 65289539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. 试析先秦及汉代文献中的“方百里” | 1 |
| 2. 北魏金陵地理位置的初步考察 | 5 |
| 3. 《中国史学》第2卷评介 | 18 |
| 4. 苏辙役法主张述评 | 24 |
| 5. 苏辙前期的革新思想 | 45 |
| 6. 苏辙与道教 | 52 |
| 7. 苏辙与道教有关的活动编年 | 64 |
| 8. 《栾城集》考 | 75 |
| 9. 《苏颖滨年表》订误 | 90 |
| 10. 宋代对政府官员的法律监督 | 98 |
| 11. 廉、仁、公、勤 ——真德秀论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 | 104 |
| 12. 关于司马光《历年图》的几个问题 | 106 |
| 13. 司马光《百官公卿表》辨析 | 113 |
| 14. 《〈稽古录点校本〉前言》质疑 | 119 |
| 15. 《宋史·艺文志》订误四则 | 125 |
| 16. 《梅仙观记》考辨 | 128 |
| 17. 王禀与太原保卫战 | 138 |
| 18. 谢涛家族研究 | 150 |
| 19. 一代名将狄青 | 166 |
| 20. 王全斌评传 | 170 |

| | |
|---|-----|
| 21. 王溥评传 | 173 |
| 22. 赵鼎评传 | 176 |
| 23. 常伦评传 | 180 |
| 24. 明代城防的宝贵经验 ——读刘以守《乘障琐言》 | 186 |
| 25. 山阴文物古迹漫谈 | 190 |
| 26. 略论耿文光及其目录学成就 | 195 |
| 27. 中国传统文官制度及其特点 | 211 |
| 28. 关于中国第一个行政学会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| 220 |
| 29. 古德诺关于创办中国第一所行政学校的构想 | 232 |
| 30. 民初文官队伍中的特殊群体 ——县知事录用与管理制度的研究 | 240 |
| 31. 移植与嬗变 ——论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 | 260 |
| 后 记 | 282 |

1 试析先秦及汉代文献中的“方百里”

田昌五先生《解井田制之谜》(《历史研究》1985年第3期)提出:“提封田行之于战国到西汉时期,它是继井田制之后出现的一种田亩制度。”进而提出:“提封田是按方百里为单位计算出来的。”并有详细的论证和推算。“提封田”并非战国到西汉时期的一种田亩制度,王煦华先生在《战国到西汉未曾实行“提封田”的田亩制度》(《历史研究》1986年第4期)一文中论之甚详,兹不赘述。笔者认为“方百里”也并不是一种田亩制度的计算单位,以下试作辨析。

田先生的论据之一为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载:“是时,李悝为魏文侯尽地力之教,以为地方百里,提封九万顷,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,为田六百万亩,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,不勤则损亦如之。”据此,田先生得出结论说:“由此可知,提封田是按方百里为单位计算出来的。不过按这里的算法来推西汉提封田中的农田数,出入很大,这可能是李悝的提封田行之于魏国,其地多为平原,山泽所占面积较小的缘故。”按:这段材料的意思是说,在百里见方的范围内,山泽邑居和可耕地各自所占的比例(这种比例出自《礼记·王制》。下文将述及),并非说“方百里”是一种田亩制度的计算单位。而且正像李悝接着又以“一夫挟五口,治田百亩”为典型例子推算农户一年的收入和支出一样,只是就一般情况大致而言,并不是说在魏国的疆域里,每一百平方里内,山泽邑居都恰好占到三分之一。因此,这条材料是不能够说明“方百里”是田亩的计算单位的。

田先生的论据之二是《商君书·徠民》的记载:“地方百里者,山陵处什

一,藪泽处什一,溪谷流水处什一,都邑蹊道处什一,恶田处什二,良田处什四。以此食作夫五万,其山陵藪泽溪谷足以给其材,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,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。”田先生认为:“这里所说的‘先王’是秦的先王,如秦孝公、昭公等,至远不会早于秦献公。以往的注疏者看到先王,就以为是三代之王,这是不对的。故这一条材料说的也是战国时期的提封田,可能是行之于秦国的。它和李悝的提封田差别有二:一是地方百里提封十万顷,故扣除五之二仍余田六百万亩。二是可耕地中包括良田和恶田,良田四百万亩按一夫百亩授田,可食作夫四万;恶田二百万亩要加倍授田,只能食作夫一万。故二者合计,共‘食作夫五万’。”这个结论也是不能成立的。《商君书·徠民》通篇是讲秦国应当如何招徠民众,全文很长,紧接着田先生所引之后便是:“今秦之地,方千里者五,而谷土不能处二,田数不满百万。其藪泽溪谷、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,又不尽为用,此人不称土也。”然后又说与秦毗邻的三晋“土狭民众”,建议秦王以给予田宅、免租免役的方法招徠其民入秦。显然,这里所说的“先王”决不是指秦的先王。如果说在秦的先王时期(姑且不论其是孝公、昭公或献公),方百里之内,可耕地已有六百万亩的话,那么为何到《徠民》篇作者(据高亨先生考证,此篇所叙史事大多发生在商鞅死后,因而不是商鞅所作。见《商君书译注》,中华书局,1974年版)上书秦王时,在秦“方千里者五”的国土上,却是“谷土不能处二,田数不满百万”,而要以各种优惠条件招徠三晋之民入秦垦植呢?因此,这里的“先王”正是如以往的注疏者所说的是指“三代之王”,或至迟是指周王。其方百里内各类土地所占的比例,也是指“先王”划分土地,安置人民的一般原则,而绝不是指战国时秦国的土地状况。田先生未能细审全文,所以作出的结论和推算均不具说服力。

考之先秦及汉代史籍,所谓“方百里”,与“方千里”、“方十里”或“方若干里”一样,只是这一时期人们谈及土地面积常用的说法之一,而绝不是一种田亩制度的计算单位。如《礼记·王制》载:“王者之制禄爵,公侯伯子男凡五等……天子之田方千里,公侯田方百里,……。”《孟子·告子下》:“天子之地方千里,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。诸侯之地方百里,不百里不足以守宗

庙之典籍。周公之封于鲁，为方百里也；……太公之封于齐，亦为方百里也；……今鲁方百里者五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。”《战国策》卷十一：“昭王笑而曰：‘寡人之地数千里，犹未敢有以难也，今孟尝君之地方百里，而因欲难寡人，犹可乎？’”，《墨子·非命上》：“古者汤封于亳，绝长继短，方地百里。……昔者文王封于歧周，绝长继短，方地百里。”《商君书·刑约》：“昔汤封于赞茅，文王封于歧，方百里。”在《史记》中“方百里”一词共出现过两次，其一是《晋世家》：“周公……于是遂封叔虞于唐，唐在河汾之东，方百里。”其二是《越王勾践世家》：“勾践……以淮上地与楚，归吴所侵宋地于宋，与鲁泗东方百里。”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：始建国元年，王莽封孺子为定安公，诏“以平原、安德、涿阴、鬲、重丘、凡户万，地方百里，为定安公国。”同年四月，刘快起兵反莽，攻即墨，其兄刘殷“闭城门，自系狱”，后刘快失败，王莽诏曰：“殷知天命，深疾恶快，以故辄伏厥辜，其满殷国户万，地方百里。”四年，王莽恢复分封制，诏曰：“州从《禹贡》有九，爵从周氏有五，……诸公一同，有众万户，土方百里。”类似记载很多，恕不一一列举。总之，在先秦及汉代史籍中，“方百里”均指土地面积，而且往往是大致而言其大小，没有一处将其当作田亩制度的一种计算单位。

此外，对田先生将其引文中所述方百里内各类土地所占的比例，当作魏国和秦国的实际土地状况而进行的计算，还须赘述数语。《礼记·王制》载：“方百里者，为田九十亿亩，山陵、林麓、川泽、沟渎、城郭、宫室、途巷，三分去一，其余六十亿亩。”《易·讼卦九二》：“不克讼，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，无眚。”《疏》：郑注《周礼》云：“小国下大夫之制。”又郑注《周礼·小司徒》云：“方十里为成，九百夫之地，沟渠、城郭、道路，三分去一，余六百夫（之地）。”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：“殷周……因井田而制军赋，……一同百里，提封万井，除山川沈斥、城池邑居、园囿术路，三千六百井，定出赋六千四百井。”不论其计算单位是“亩”、“井”或“一夫之地”，都是说在方百里或方十里的范围内，山川、道路、邑居等大体占到三分之一左右。当然这只是“先王”认为最适宜人们生产、生活的比例，即所谓“先王制土分民之律”，而绝非实指。因为各封国的地理位置不同，其国土中各类土地所占的比例，只能依地理形

势而定,决不可能整齐划一。由上述可知,田先生两条引文中所说的方百里内各类土地的比例,也并非实指魏国或秦国的土地状况,田先生据其计算出来的结果,当然也是不可靠的。

(原载《河北学刊》,1994年第2期。)

2 北魏金陵地理位置 的初步考察

北魏从昭成皇帝什翼键到献文皇帝拓跋弘共七帝,还有一大批皇后、宗室、功臣等,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,先后葬于北魏前期的皇陵——金陵。然而一千六百年来,金陵何处?竟成千古之谜。本文试依据文献和考古材料,对这一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索。

一、金陵墓主

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名大多各不相同,而北魏孝文帝以前诸帝之陵却统称金陵。据《魏书》记载,北魏最早葬于金陵的是平文皇后王氏,于建国十八年(公元355年)入葬,最晚葬于金陵的是孝文贞皇后林氏,太和七年(公元483年)入葬。在这一百二十八年中,仅《魏书》明确记载葬入金陵者,就有七位帝王、十位皇后、六位宗室、十八位功臣,现将其分别列表于下。

葬于金陵的帝王有:

| 帝号及姓名 | 入葬时间 | 埋葬地点 | 材料来源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|
| 昭成帝拓跋什翼键 | 东晋太元二年(377) | 金陵 | 《魏书·太祖纪》 |
| 道武帝拓跋珪 | 永兴二年(410) | 盛乐金陵 | 《魏书·太祖纪》 |
| 明元帝拓跋嗣 | 泰常八年(423) | 云中金陵 | 《魏书·太宗纪》 |
| 太武帝拓跋焘 | 正平二年(452) | 云中金陵 | 《魏书·世祖纪》 |
| 景穆帝拓跋晃 | 正平元年(451) | 金陵 | 《魏书·世祖纪》 |

续表

| 帝号及姓名 | 入葬时间 | 埋葬地点 | 材料来源 |
|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|
| 文成帝拓跋濬 | 和平六年(465) | 云中金陵 | 《魏书·高宗纪》 |
| 献文帝拓跋弘 | 承明元年(476) | 云中金陵 | 《魏书·显祖纪》 |

按:拓跋晃为太武帝长子,文成帝之父,延和元年立为皇太子,未即位而卒,文成帝立,追尊其为景穆皇帝。

陪葬金陵的皇后有:

| 皇后姓氏 | 入葬时间 | 埋葬地点 | 材料来源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平文皇后王氏 | 建国十八年(355) | 云中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|
| 献明皇后贺氏 | 皇始元年(396) | 盛乐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|
|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 | 泰常五年(420) | 云中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|
| 明元密皇后杜氏 | 泰常五年(420) | 云中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|
| 太武皇后赫连氏 | 兴安二年(453) | 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《魏书·高宗纪》 |
| 太武敬哀皇后贺氏 | 神鼎元年(428) | 云中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|
| 景穆恭皇后郁久闾氏 | 兴安元年(452) | 云中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《魏书·高宗纪》 |
| 文成元皇后李氏 | 太安二年(456) | 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|
| 献文思皇后李氏 | 皇兴三年(469) | 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|
| 孝文贞皇后林氏 | 太和七年(483) | 金陵 | 《魏书·皇后列传》 |

陪葬金陵的宗室和功臣有:

| 姓名 | 爵位 | 官职 | 埋葬时间 | 材料来源 | 备注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拓跋吕 | 江夏王 | 外都大官 | 不详 | 《魏书·神元平文诸帝子孙列传》 | 太祖族弟 |
| 拓跋素 | 常山王 | 内都大官 | 和平三年 | 《魏书·昭成子孙列传》 | 太宗从母所生 |
| 拓跋勃 | 彭城公 | 不详 | 不详 | 《魏书·昭成子孙列传》 | 昭成帝之孙 |
| 拓跋粟 | 彭城王 | 不详 | 不详 | 《魏书·昭成子孙列传》 | 勃长子 |
| 拓跋处文 | 长乐王 | 年十四即卒未授官职 | 泰常元年 | 《魏书·道武七王列传》 | 道武帝之子 |

续表

| 姓名 | 爵位 | 官职 | 埋葬时间 | 材料来源 | 备注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拓跋云 | 任城王 | 长安镇都大将、雍州刺史 | 太和五年 | 《魏书·景穆十二王列传》 | 景穆帝之子 |
| 长孙道生 | 上党王 | 司空、侍中 | 正平元年 | 《魏书·长孙道生传》 | 本传未记葬所,但其孙观附传云:“葬礼依其祖靖王故事,陪葬云中金陵” |
| 长孙观 | 上党王 | 征南大将军 | 不详 | 《魏书·长孙道生传》附 | 长孙道生之孙 |
| 长孙肥 | 蓝天侯 | 镇远将军、兖州刺史 | 天赐五年 | 《魏书·长孙肥传》 | |
| 长孙翰 | 平阳王 | 司徒安集将军 | 神䴥三年 | 《魏书·长孙肥传》附 | 长孙肥之子 |
| 长孙平成 | 平阳公 | 中散、南部尚书 | 不详 | 《魏书·长孙肥传》附 | 长孙翰之子 |
| 长孙陈 | 吴郡王 | 安东将军、散骑常侍 | 不详 | 《魏书·长孙肥传》附 | 长陵孙肥之子。“陈”,《北史》卷二十二作“陵” |
| 奚斤 | 弘农王 | 征南大将军、万骑大将军 | 太平真君九年 | 《魏书·奚斤传》 | 本传未记葬所,但其侄乌侯附传载:“丧礼依其伯父弘农王故事,陪葬金陵。” |
| 奚乌侯 | 城阳公 | 员外散骑常侍、虎牢关镇将 | 兴光年间 | 《魏书·奚斤传》附 | 奚斤弟普回之子 |
| 叔孙建 | 丹阳王 | 征南大将军 | 太延三年 | 《魏书·叔孙建传》 | 其父叔孙骨为昭成母王太后所养,与皇子同列 |
| 叔孙俊 | 安城王 | 侍中、司空 | 泰常元年 | 《魏书·叔孙建传》附 | 叔孙建之子 |
| 恒氏 | | | 泰常元年 | 《魏书·叔孙建传》附 | 叔孙俊妻 |
| 王建 | 真定公 | 散骑常侍、冀青二州刺史 | 不详 | 《魏书·王建传》 | 其祖姑为平文皇后 |
| 车路头 | 宣城王 | 侍中、左卫大将军 | 泰常六年 | 《魏书·车路头传》 | |
| 司马楚之 | 琅邪王 | 云中镇大将、朔州刺史 | 和平五年 | 《魏书·司马楚之传》 | |
| 陆丽 | 简王 | 司徒、太子太傅 | 和平六年 | 《魏书·陆俊传》附 | |
| 源贺 | 陇西王 | 侍中、太尉 | 太和三年 | 《魏书·源贺传》 | |
| 罗斤 | 带方公 | 长安镇都大将 | 不详 | 《魏书·罗结传》附 | |
| 罗拔 | 赵郡王 | 征西将军、吏部尚书 | 不详 | 《魏书·罗结传》附 | 罗斤之子 |
| 姚黄眉 | 陇西王 | 内都大官、太常卿 | 不详 | 《魏书·外戚传》 | 太宗昭哀皇后之弟 |

以上均为《魏书》明确记载其葬于金陵者，实际上葬于金陵的人数应远远不止于此。一个规模如此庞大、经营时间如此之长的北魏皇陵，究竟位于何处？以下我们先从文献中来考察它的地理位置。

二、文献中金陵的地理位置

在现存的北魏文献中，关于金陵的记载仅有零散的只言片语，我们试从其中来推断金陵的地理位置。

《魏书·太宗纪》：永兴三年五月，“车驾谒金陵于盛乐”；《魏书·世祖纪》：始光三年六月，“幸云中旧宫，谒陵庙。”

据此，则金陵应在盛乐或云中附近。而且从前面各表也可以看出，金陵或称盛乐金陵，或称云中金陵。考盛乐为北魏迁都平城前国都之所在，其地西汉为定襄郡治，东汉移定襄郡治善无，以县属云中郡，故城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北十公里，遗迹尚存^①。而北魏前期之称云中者，则有两地。其一为魏初于西汉定襄之盛乐县故城所置之云中郡（迁洛之后，改盛乐之云中郡为盛乐郡，而于秦云中郡故城别置云中郡）。其二为云中宫，即《水经·河水注》所云：“白渠水又西，迳魏云中宫南。《魏土地记》云：‘云中宫在云中县故城东四十里’”。《魏书》亦称之为“云中旧宫”、“云中大室”，其地在盛乐与秦云中故城（今内蒙托克托东北）之间，亦属盛乐界内。这就可以进一步确定金陵必在盛乐古城周围。但具体在盛乐的什么方位？《大清一统志》及王仲萃先生《北周地理志》均认为金陵在“盛乐城之西北”，可是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作了大量的调查，却未发现北魏皇陵的遗迹，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考察文献记载。据《魏书·高祖记》载：太和十八年七月壬辰，“车驾北巡，戊戌，谒金陵，辛丑，幸朔州”。考朔州治盛乐，而孝文帝从平城出发由南向北，先至金陵而后到盛乐，则金陵应在盛乐之南。又《魏书·高祖记》：太和二十一年二月，“车驾至平城。甲戌，谒永固陵。癸未，行幸云

^① 《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》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。

中。三月庚寅,车驾至自云中。辛卯,谒金陵。乙未,车驾南巡”。从地理形势看,孝文帝此次出巡的路线是从平城向东北至方山永固陵,然后沿如浑水(今御河)向北出得胜口而至云中(据谭其骧先生考证,云中郡在太和二十一年时尚治盛乐。见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第四册),然后由盛乐南返,在归途中拜谒金陵,亦可证金陵在盛乐之南。然而无论说金陵在盛乐城北还是城南,均属于依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推断,要真正确定金陵的具体位置,只能靠新的考古发现。

三、右玉北魏墓葬群的发现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,雁北文物工作站张畅耕同志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,在山西右玉县城(梁家油坊)西北10公里处的大南山顶发现了两座古墓,经初步推断,认为与北魏金陵有关。八四年四月,在地、县有关部门的支持下,组成了金陵考察组(笔者为考察组成员之一)。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,几乎跑遍了右玉境内以及右玉与和林格尔、左云、山阴、平鲁交界的主要山峰,共发现较大的墓葬十四处,分布面积达1500多平方公里。其地表遗物特征与盛乐古城及方山永固陵的遗物特征完全一致,如水波纹、连珠纹、高领盘口壶及细绳砖等,均为典型的北魏风格,可判定其为北魏墓葬无疑。现按其地理分布由北向南分述如下。

马头山 位于右玉县李达窑乡东北5公里,海拔1768米。主峰顶上一南一北有两座古墓,相距约百米,当地群众分别称之为“南马耳”、“北马耳”。距主峰东1000米处的另一峰顶上有墓一座。各墓封土均呈半圆形,冢表用玄武岩石块覆盖。基底为方形,系石砌护墙内填土筑成,人工垒砌痕迹十分清晰。北冢基座高1米、长22米、宽16米,封土高5米。南冢基座高约1米、长16米、宽14米,封土高4米。东冢基座高0.7米、长25米、宽20米,封土高5米。三座墓的周围还有一批较小的墓冢,因风化水冲,封土已不太明显,尚可辨识者有十座左右。各墓之前的地面上有大量的碎陶片,多为夹砂灰陶,纹饰有小方格纹、水波纹等。可辨识器形者有盘口壶口沿,

还有不知器形的圈足底等。地面还散落有布纹瓦残片,人工加工过的石条及锈蚀严重的铁片。

塘子山 位于右玉县杀虎口镇东北1公里处,海拔1479米。峰顶有古墓一座,封土呈半圆形,下有方形基座。基座系土筑而成,因前面被近代取土扰动,前后高度不一,前高1.3米,后高3.8米,长宽均为32米。封土高4米,封土前有一近代取土坑,靠墓一侧出露人工垒砌排列整齐的石墙。墓前地面上散落着许多夹砂灰陶片,纹式有凹旋纹和凸旋纹,还有布纹瓦、方格纹瓦及细绳纹砖残片。

东团山 位于右玉县乔家窑村东北2.5公里,海拔1735米。峰顶有墓两座,一东一西排列。封土呈正方形锥体,下有方形基座。东冢基座用石条砌成,残高0.2-0.4米、长宽均为30米,封土高6米。墓东北角有一大坑,靠墓一侧出露石墙,人工垒砌痕迹十分清楚。石墙出露部分长2米,高1.5米,方向为正北。西冢基座用土筑成,因流失严重,呈缓坡状,与封土界限不太明显,高约0.5米,长宽均为15米,封土高4米,冢表覆盖石块。地表遗物有碎陶片、布纹瓦残片和人工加工过的石条。陶片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,多饰以细弦纹,有盘口高领罐口沿和假圈足器底等。

西团山 位于右玉县北崔家窑村北,海拔1710米。峰顶有墓一座,封土呈半圆形,下有方形基座。基座用石砌护墙内填土筑成,其西北角保存较好,高1米、长38米、宽34米。封土高4米,表面覆盖石块。地表散落着许多碎陶片,陶质为夹砂灰陶,饰以弦纹、细绳纹。当地群众称此墓为“王坟疙瘩”。主墓东约100米处,有小墓十一座,每墓间隔5米左右,墓表均覆盖石块。主峰南面约1.5公里处有一建筑遗址,有夯土痕迹,遗物有布纹瓦、细绳砖和陶质兽头残件,从地形看,似为此墓的门阙所在。

乔家山 位于右玉县乔家山村东北0.5公里处,海拔1953米。主峰顶有墓一座,主峰西2公里处的另一峰顶有墓一座。封土呈半圆形。基座用土筑成,因风雨侵蚀与封土的界线不明。东冢封土高5米,西冢封土高4米。地表散布有夹砂灰陶碎片,纹式为凹凸旋纹。有侈口器口沿残片。墓前山坡上铺有两行平行的人工垒砌的石块,似为通往墓冢的道路。

卧羊山 位于右玉县石塘村北1公里,海拔1783米。峰顶有墓两座,一东一西排列,相距约70米。封土呈半圆形,基底为方形。东冢基座系石砌护墙内填土筑成,高2米、长30米、宽29米。封土高6米,冢表覆盖玄武岩石块。西冢被一明代烽火台扰动,基座高度不明,长宽均约25米。封土高4米。地表遗物有夹砂灰陶碎片,纹式为凹凸旋纹,有盘口罐口沿和甑底残片。东冢南面有一段宽约8米,用石块铺成的道路。

平顶山 位于右玉县牛心村北5公里处,海拔1689米、峰顶有墓两座,一南一北排列,相距约百米。封土呈覆斗状,下有石砌方形基座。东冢基座高1米、长宽均为42米,靠北的石墙保存较好。封土高7米,冢表覆以石块。西冢基座高约0.70米、长35米、宽25米,封土高6米。地表有夹砂灰陶、红陶残片,饰以弦纹,还有布纹筒瓦残片。

大南山 位于右玉县城西北约10公里,海拔1592米。当地群众称此山为“王坟疙瘩”。峰顶有墓两座,东西并列。封土呈圆锥形,下有石砌方形基座。西冢石砌基座共分三层,逐层内收,高约3米,最外层石墙长74米,宽43米,封土高6米。东冢石砌基座为二层,逐层内收,最外层的石墙长约20米、宽11米,封土高5米。地表有大量的碎陶片,陶质为夹砂灰陶,纹式有水波纹、连珠纹、人字纹、细弦纹等,也有素面夹砂灰陶。还发现有素面大砖、绳纹小盘、方格纹板瓦和不辨器形的残铁片。

据清雍正十一年(1733)所修《朔平府志·方輿古迹》载,此山有孝文碑,碑“在县南(指右玉城)三十里大南山中,碑缺不全,字磨灭不显,以土粉印之,可辨者有‘三宝显明(缺)积侍郎内院(缺)广武(缺)郡太子侍(缺)孝文石名李贺(缺)光(缺)年四月十日上为孝文皇帝文明(缺)百七十里(缺)敦山顶造(缺)天禄及七世所往前死后(缺)千百叶(缺)国家和门(缺)用之无匮(缺)伯曾祖’字样,余俱不成文,不知为何朝孝文。明嘉靖间,分守大同中路参将李蓁、守备张玺重修大南山古刹显明寺,有碑上刻‘汉孝文曾驻兵于此,因墓于山,遂建寺曰显明,供佛,命僧焚修,旧碑存焉’等文”。查《朔平府志·艺文志》有明正德年间蒋廷梁所撰《大南山古刹显明寺重修碑记》,记云:“大同右卫郡曰恒阳,去云中六舍许,分守镇城,昔古定边也。

……去城南一舍许,有名山曰大南山。山之阳,古刹胜地,一区肇自。汉孝文曾驻兵于此,因墓于山,遂建寺名曰显明,供佛,命僧焚修,旧碑存焉,历唐宋以至于今日”。据此可知,蒋廷梁撰文时亦曾见到此碑,可惜其未详录碑文而只是撮略大意,到清雍正年间,其碑尚存。根据这一线索,我们在大南山仔细搜寻,但显明寺早已荡然无存,孝文碑亦不知去向。后在大南山下小蒋村访问群众,知此碑已被村民从山上运至村内,作了纳凉坐的石墩。因多年风化磨损,特别是人工撞击,已不具碑形,只是一块近正方形的石墩。厚约47厘米,残存碑面长宽均约50厘米,约可容纳五十八字,但绝大部分已湮漫不清,无法辨识。经拓印勉强可以辨认者仅有“畿(缺)侍郎内(缺)伎十五人善(缺)孝文(缺)名李(缺)上为孝文皇帝文明(缺)”数字,比雍正时所见又少了许多。

那么此碑究竟是为汉孝文还是为魏孝文而立呢?《朔平府志》的编者认为:“汉孝文初封代王在今蔚州,后又幸太原,似为可据。但汉孝文迄今将近二千年,碑在山中,风日所损,恐其字难存至今。且佛法汉明帝时始入中国,文帝时尚无佛法,何得有显明寺?而汉官又无内院。魏孝文在汉孝文后六、七百年,且先都平城,至此山不足二百里,于缺碑中百七十里字近似,疑是魏孝文碑,其石刻书法又似唐人碑。”从各方面情况来看,《朔平府志》的考证是正确的。首先,汉孝文帝霸陵现已发现在陕西西安市东郊,因此不可能在大南山“因墓于山”。其次,正如《朔平府志》所言,佛教在东汉末始传入中国,当然就更不可能在西汉文帝时建什么显明寺。因而此碑必是为魏孝文帝而立。

但其为何时所立?现从残碑文字已无法推知,仅见其楷书风格确似唐人手迹。查《文献通考·宗庙考》,开元二十一年,“云州置魏孝文帝祠堂,有司以时享祭”。注云:“州有魏故明堂遗迹,乃于其上置庙焉”。考右玉唐置静边军,为云州辖区,则此碑很可能是唐人所立。

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,即魏孝文帝迁洛后,“乃自表瀍西以为山园之